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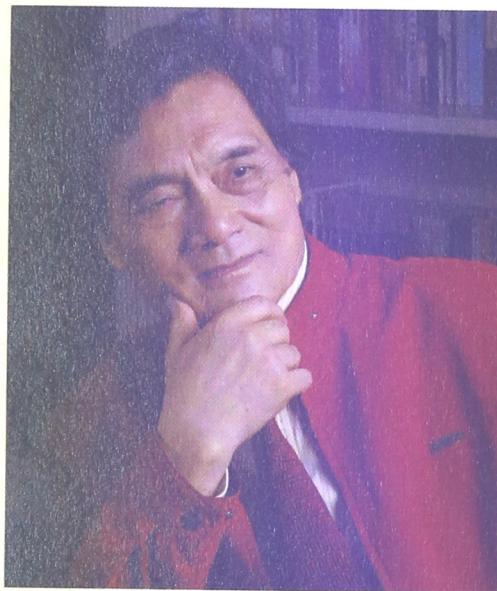


中国音乐学院科研与教学系列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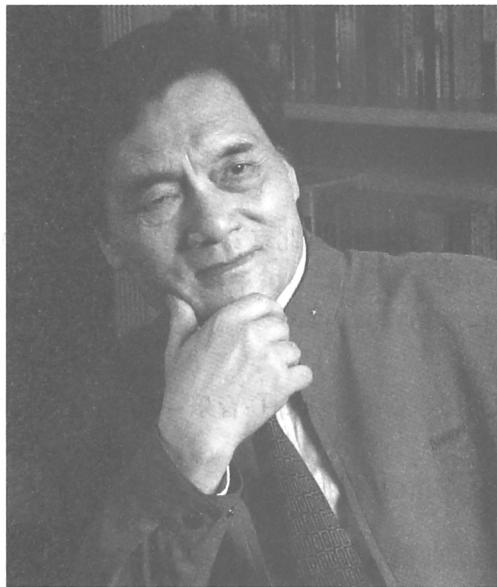
探究无限

——金湘音乐论文集之二

金 湘 / 编著



014038387



探究无垠

——金湘音乐论文集之二

中国音乐学院科研与教学系

J6-53

05

金湘 / 编著



J6-53

65



北航

C1723864

人民音乐出版社·北京

014038384

Tanjiu Wuyi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探究无垠 / 金湘编著. -- 北京 :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4.1

(金湘音乐论文集 ; 2)

ISBN 978-7-103-04433-9

I. ①探… II. ①金… III. ①音乐 - 文集 IV. ①J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8141号

责任编辑：陈胜海

责任校对：陈芳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甲55号 邮政编码: 100010)

[Http://www.rymusic.com.cn](http://www.rymusic.com.cn)

E-mail: rmyy@rymusic.com.cn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80×1230毫米 32开 23印张

2014年1月北京第1版

201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定价: 65.0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请与读者服务部联系。电话: (010) 58110591

网上售书电话: (010) 58110650 或 (010) 58110654

如有缺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电话: (010) 58110533

海国图志》等书籍上都有记载。中国民族音乐本真面貌的恢复，是民族音乐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民族音乐的研究，要从民族音乐的本真面貌出发，不能以西方音乐理论为标准，而应以民族音乐自身的特征为依据。民族音乐研究者在研究民族音乐时，要注重民族音乐的本真面貌，不能将其与西方音乐混为一谈。

《中国音乐学院科研与教学系列丛书》序

中国民族(传统)音乐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历代文人雅士、民间艺人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音乐文化遗产。它种类繁多，积淀丰厚，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也是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音乐长期以来主要以口传心授的模式，在民间、宫廷、宗教和文人群体中传承。进入20世纪后，整个中国社会进行变革，民族音乐的生存环境也产生了巨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尤其是高等专业艺术院校，已经成为传承、发展民族音乐的一个重要载体。高等音乐艺术院校的民族音乐教学建设，要落实在课程建设上。在它的背后，需要一整套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尤其是系统的教材来支撑，并且通过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才能构建音乐教学体系，使得民族音乐在高校乃至更广的范围内推广。

中国音乐学院作为国内从事民族音乐教学和科研的高等音乐学府，肩负着振兴民族音乐、推动“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建设的历史重任。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们编纂了这套《中国音乐学院科研与教学系列丛书》，包括音乐学、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民族器乐、民族声乐等方面的研究、创作成果和教材，向学界陆续推出。例如，作为先期工程的民族器乐教材部分，由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的教授、副教授们结合自身多年教学实践和心得积累，通过广泛调研、协同攻关完成。与以往的民族器乐教材相比，这些教材更加注重规范化和系统性。民族器乐的演奏需要娴熟、严

谨的技术训练作为支撑,书中收入的乐曲主要为练习曲或技术训练作品,可以集中解决民族器乐演奏中的技巧训练问题。无论是笛子、唢呐、三弦,还是打击乐专业的学生,通过该教材的系统学习与训练,能够基本解决该专业乐器的主要技术问题。这无疑可以进一步完善民族器乐循序渐进的科学训练方法。

另外,强调原创性也是该套丛书的突出特点,书中所使用的实例大部分由作者创作。这些作品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其多为丛书作者常年教学、演奏心血的结晶,有着很高的学术性和实用价值。

高等艺术院校作为专门培养“高精尖”音乐人才的场所,在全国音乐艺术教育领域起着引领作用。我们希望这套《中国音乐学院科研与教学系列丛书》,能够为高校民族音乐的传承、教学、传播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能够为“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探索和建立贡献出一份力量。

赵塔里木

2009年10月

“做音乐研究”与“写文章”相比，我本人对后者更感兴趣（当然，这与年龄、经历、兴趣爱好等都有关系）。我过去常常在创作之余，把一些有关作曲的感想、体会、经验、教训，以及对某些理论问题的看法，用文字记录下来，或整理成文。但这些文字，过去都是散见于乐曲集、乐谱集、乐评集、乐论集中，没有系统地整理过，也没有单独出版过。

前　　言

我之所以要整理出这些文字，是因为近来常有朋友问及我的音乐创作情况，而我常常答非所问，不能很好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原因之一是，我过去写的文章，多是随笔性质的，没有系统地整理过，也没有单独出版过。因此，我决定整理一下，以便能更好地回答朋友们的问题。

金湘

2003年1月于北京家中
原载《中国音乐》2003年第1期
“歌·思·乐”专栏，后收入《困惑与求索》一书，略有改动。

本文集是我从近15年内写就的文章中选出汇编而成。它是我第一本论文集《困惑与求索》的延续与发展，也可以说是它的姐妹篇。

我一直认为，作曲是我本行，理论则是“玩票”；我没有规定自己一定要去写文章，搞理论，只是在社会生活、音乐创作实践中感悟到了一点什么（疑点），发现到了一点什么（亮点），从而去思考、探究，并把它们记诸文字，这才有了一个个观点，一篇篇文章。常常是在完成音符的写作之后，许多思绪迫使我又提笔书写文字——作曲、理论交替进行。这种创作实践—理论研究—再创作实践—再理论研究的学术方式，已成了我不可改变的习惯与嗜好、不可替代的生活方式；如此顺其自然，久而久之，就有了我特有的创作与理论并行不悖的双栖活动。

其实，宏观地看，人类的思维活动，不论形象思维也好，逻辑思维也好，根本上都是人的大脑对客体（社会的、宇宙的）的反映。它是一个主体的两个侧面。它们确实各不相同，可以分得很细，而且在各自的道路上可以、并已经走得很快；但它们却又能在更高的层面上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相得

益彰。(可惜这一点并未被许多人认识,但却早为人类文明史上诸多大师的实践所证实!)正是这种信心与乐趣、追求与感觉,使我毫不勉强地、十分自然地、自觉而从容地走上了音乐创作和理论探究的“双栖”道路,并将继续走下去!

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访美回国后至今,我写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其中包括 4 部歌剧:《杨贵妃》、《八女投江》、《楚霸王》、《热瓦普恋歌》;8 首交响曲:交响三部曲之一《天》、小交响曲《巫》、交响序曲《1997》、交响抒情诗《啊,Macau 我的澳门》、交响叙事曲《塔西瓦依》、交响序曲《新疆》、序曲《汶川大地震》、竖琴与弦乐《湘湖情》;两部协奏曲:大管协奏曲《幻》、琵琶协奏曲《琴瑟破》;4 首民族交响乐:二胡与乐队《索》、笛子与乐队《冥》、弓弦乐与打击乐《花季》、管弦乐《离骚》;两首交响大合唱:《金陵祭》、《宋词六首》以及若干室内乐、钢琴、声乐作品;在此基础上前后共开了 4 场个人作品音乐会(两场民族交响乐作品音乐会于 1996 年 11 月、2011 年 5 月;一场歌剧—音乐剧作品音乐会于 2007 年 9 月;一场交响乐作品音乐会于 2009 年 3 月)。我之所以列举这些曲目,是因为没有它们,就没有我的理论研究!围绕着这些作品,我写了不少创作札记、乐曲分析,我将它们汇编在本文集的“创作篇”中,供读者了解;有兴趣的朋友还可对照乐谱阅读此类文章。

迈入 21 世纪以来,我陆续提出一些理论观念,主要有 5 点:

1. 音乐创作中的五类学科:旋律学、多声部学、结构学、载体学、织体学。
2. 歌剧思维的四方面体现:结构、语言、技法、观念。
3. 东方美学在音乐创作中的体现:空、虚、散、含、离。
4. 民族传统的三个层面:上层——形态学,中层——结构学,底层——哲学美学。

5. 新世纪中华乐派之建设与发展(见总纲提要)。

围绕上述 5 个方面,我陆续写了一批文章,有的内容、论据都较完整充实,有的则只是一个提纲,提出了一个论点,还大有展开的余地。我将它们汇编在本文集的“理论篇”中,供大家继续讨论、研究、补充、展开。

我在进行创作与理论的实践中,不断得到社会上、业内外朋友们的多方关心与支持。“一石激起千层浪!”我在征得了作者同意后,选择了一批他们的文章与书信汇编在本文集的“回响篇”中;这样做既是为了对自己的激励与鞭策,也是便于读者了解事物的全貌,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也是对当代音乐史料的一种积累与贡献!

学术上的相互评论、探讨、甚至碰撞,既是我的学风一贯具有开放性、探索性的个性体现,亦符合“否定之否定”这一普遍辩证规律。对来自社会各方的各种反馈,我不仅虚怀若谷认真吸取,而且还视为是我的“探究”的延续!只有我们这种共同的“探究”,才会真正地推动社会前进!而这也正是我进行一切创作—学术活动目的之根本!

还有一些不能归入上述 3 类而又无法舍弃的,将收入“其他篇”中。

以上 4 个篇章(部分)组成了本书构架,为读者阅读方便,在此絮叨一二,是为前言也。

2011 年 3 月 16 日于北京

序

—

汪毓和与人共

首先《唱支山歌给党听》(贺敬之词)成为“文革”时期革命歌曲中传唱最广的一首。这首歌是贺敬之在内蒙古自治区工作时创作的，歌中唱道：“一条大河向东流，两岸青山相对出，只因风浪急，才继续走了五千里”。旋律悠扬，歌词朴实，唱出了人民的心声，唱出了时代的脉搏。这首歌后来被编入小学教材，成了孩子们耳熟能详的歌曲。这首歌的词曲作者贺敬之，也是“文革”时期的文学家，他的诗作《回延安》、《毛泽东词两首》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他与金湘同为燕京大学中文系学生，“文革”期间，金湘改学音乐，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而贺敬之则考取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他们都是“文革”时期的文艺工作者，但命运却截然不同。贺敬之在“文革”期间，虽然没有受到迫害，但他的作品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他的诗作《回延安》、《毛泽东词两首》等，虽然广为传唱，但在“文革”期间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而金湘则在“文革”期间，虽然没有受到迫害，但他的作品却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他的诗作《回延安》、《毛泽东词两首》等，虽然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但在“文革”期间却得到了应有的重视。金湘在“文革”期间，虽然没有受到迫害，但他的作品却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他的诗作《回延安》、《毛泽东词两首》等，虽然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但在“文革”期间却得到了应有的重视。金湘在“文革”期间，虽然没有受到迫害，但他的作品却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他的诗作《回延安》、《毛泽东词两首》等，虽然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但在“文革”期间却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早在 1951 年中央音乐学院全院师生响应中央号召“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深入生活的锻炼中，我与金湘就意外地开始认识。当时，他和我同在学校“治淮工作一队”，共同被派驻苏北开挖从洪泽湖至东海边的“灌溉总渠”、高邮县大队农民工的“淮安段”工地。我们“一队”的队长是作曲系的赵行道老师（他毕业于燕京大学音乐系、随燕大师生合并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从事教学，上世纪 80 年代后先后任该系作曲教研室主任等职），副队长是院部辅导科的刘沫老师。同在第一队的还有本科生杜勃兴、杜兆植、刘诵芬、温淑曾、沈灿、蒲以穆、李洗、郭志鸿（郭沫若之子）以及“少年班”的张传德、张应元、梁庆林、岑元鼎等。金湘当时就是来自“少年班”中的一员，他给人的印象非常聪明、非常热情、活跃，既会唱歌又会即兴快板、诗歌朗诵等。我简直没想到他的专业是大提琴，仿佛与我们作曲系的学生一样，只是年龄比我们小一些而已。

半年“治淮”结束后，他先在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了两年，后又被保送本科作曲系学习。但在 1957 年的所谓“反右”斗争中，他被错划为“右派”，毕业后被分配到新疆阿克苏地区文工团工作。直到“文革”结束，他得以“改正”后，才调回北京。先在北京歌舞团交响乐队任指挥和作曲，五年后（1984 年）调入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任教。从他调回北京工作后，我们的交往才得以重新延续。特别在当时音乐界掀起一股争学西方的所谓“新潮”热浪中，他坚持自己创作的浓郁民族风情和朴实动人的旋律，为人们所称道。使我高兴地觉得他的坎坷命运，仿佛转变为“上帝”给他难得的补偿，他的艺术创造力更顽强有力了，他在艺术上更成熟了。

他从新疆回京后的创作，最先引起我深刻印象的是在 1986 年“全国合唱作品评奖”中荣获二等奖的《诗经五首》（创作于 1985 年）。接着不久，于 1987 年他完成了自己“里程碑”性的作品——歌剧《原野》。记得这部歌剧在北京首演时就是他本人特地将一张入场券送到我家，希望我一定能抽时间前往观赏。尽管曹禺先生过去这部话剧曾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尽管当时这部经过万方改词、金湘作曲的歌剧，首演仅只七成左右观众，而且那次首演可能仅演出了不多几天就停演了，他的这部歌剧的音乐仍给我留下久久抹不掉的震撼。后来在我的教学中它始终是作为我国上世纪 80 年代的主要代表作介绍给我的学生。而且，在课堂上所用的乐谱和音响也是由金湘本人无偿地给我提供的。

最使我惊喜的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读到了他送我的第一本文集《困惑与求索·一个作曲家的思考》。当时他已是在世界乐坛开始崭露头角的中国作曲家，正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美国深造。作为一个正当红的中年作曲家，在我国作曲事业面临巨大转折的关口，他公然向大家表示

自己面临新的“困惑”和进一步“求索”，这是多么令人敬佩的宽广胸怀啊！说明他丝毫没有在自己的工作成就和所取得的各方面赞誉面前忘乎所以，相反他还在为夺取中国音乐发展的巅峰而上下求索。我想如果我们年轻一代都能像他那样，怀抱着一颗对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将来的真诚“红心”，努力顽强地“实践—思考总结—再实践—再思考总结”，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将会得到多么宏伟远大的前途啊！

金湘是一位富于创作灵感、勤于通过对音乐的创作、自由表达自己对客观现实丰富反响的作曲家。特别是从新疆返回北京工作之后，他对音乐创作的各种体裁（小至艺术歌曲、钢琴等小型器乐作品，大至交响音乐、歌剧等）都有了大胆的涉猎。在他的各种音乐创作中仿佛在他的脑海中充满了极其丰富的、各种各样朴实、凝练、优美、爽朗的旋律的泉源，随着他情感的宣泄迅速转化为丰富多样的音符，或似汹涌奔腾的狂涛、或似静静流淌的涓流，源源不断地倾泻而出。我不否认他或许具备一种超出于常人的音乐天才，但我觉得他自幼受到作为一个出身于中国乡村教师，终身为中国师范教育献身的家庭的严格熏陶，从小就在中国抗战烽火中所得到的种种苦难的淬炼，以及从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后即被迫离开中国较早得到开发的东方大都市、远赴西北边陲重新与劳动人民同生共死二十多年的宝贵经历，使他拥有了远远超出中国城市青年所严重欠缺的对中国辽阔大地、中国朴实勤劳的劳动人民群众的大爱真知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也觉得他从过去国立音乐院“少年班”中所得到的严格音乐基本训练（尤其是

视唱练耳、音乐名作欣赏和大提琴演奏),以及他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系统培养和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多次组织的深民间采风的实践所练就的、一般课堂教学所无法得到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仅仅具备来自先天的超常才能,充其量可以造就一些沉醉于花丛的“精美小鸟”而已,而长期后天的严格训练,再加上饱尝人类艰苦生活的淬炼和丰富的民间艺术的长期积淀,才是造就真正奔向“艺术大师”路途的牢固根基。

三

金湘是一个勤于动笔也善于动笔的作曲者,我想在他远赴新疆前在京津地区生活工作期间,以及他在新疆边陲生活工作的 20 年间,肯定就留有不少他的音乐创作。但是,大家现在所知的他的作品,几乎大多是他返回北京工作 30 多年间所写的。就只 30 多年,他可以说是没日没夜奋笔疾书地创作了惊人数量的、几乎涉及音乐所有体裁的作品。这个现象从表面看,或许是出于想趁自己还保持珍贵的时间和精力,将过去被耽误而无法完成的心愿和长期在基层所获得的丰富艺术资源,尽早一一都“抢回来”。但是,我发现金湘自编的第一本文集《困惑与求索》,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外部环境的改变和时代发展的新形势下,出于如何更好地完成祖国赋予作曲家的时代使命感而提出的。在这样的神圣使命感的推动下,他不仅写出了《原野》、《楚霸王》、《八女投江》等各具特色的歌剧和《诗经五首》、《金陵祭》、《宋词六首》等精心制作的大型声乐套曲外,他又向一个新的、非常艰难的民族交响乐领域发起了新的冲击。同时,他又严肃认真地向音乐界提出了发展“中华乐派”的庄严号召,和如何将此实现的种种大胆理

论思考和设想。因此,我认为是一个艺术家对祖国复兴的使命感和对民族艺术不断发展的真诚愿望,才是他这几十年无怨无悔地忘我劳动的永不枯竭的源泉。当然,我并不认为金湘所有的艺术创新都已达到了十全十美的地步,相反任何创新总要付出艰辛踏实的实践(包括自己个人的以及集体共创的)和经过千锤百炼的磨炼,才能一点一滴地积淀而成。但有没有这样的壮烈宏愿,有没有这样的坚毅决心,是一个能否朝着艺术巅峰挺进的可靠的试金石。金湘在个人成就基本取得社会承认的前提下又庄重地提出“困惑与求索”的直白,显然他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祖国、人民、民族,这种精神和胸怀,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仅应该具备丰富的生活、文化的修养,还应该具备踏实牢固的掌握本门专业技术训练的根底,又应该在思想理论上是一位永不停息的勇士。金湘就是我有幸所遇到的既热情于创作又善于思考的好友。在他长期从事艰辛创作劳动的过程中,他总是牢牢掌握:“实践—总结思考—再实践—再总结思考”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规律,不断提出十分宝贵的艺术见解和抱负。他是我国不多见的集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于一身的双栖人物。如他提出的“歌剧思维”,对创作歌剧的重要性及如何正确掌握歌剧思维应抓住几点关系的见解;如他提出的作曲家如何正确处理继承传统和大胆创新的辩证关系的见解,以及如何搞好音乐创作必须具备“旋律学”、“多声部学”、“结构学”、“载体学”、“织体学”五方面基础的要求,有关“空、虚、散、含、离”的东方美学的原则,以及有关继承

民族传统的3个不同层面的观点,等等。其实这些在他第一本文集《困惑与求索》中已得到初步的萌发,值得音乐界,特别是当前音乐创作后学者重视的。经过将近10年的实践,金湘又将付梓的第二本文集,则是他在思想上又一次为“自我解惑和向人求索”的新的努力。金湘之所以能在音乐创作中始终保持那种“真诚、坦率、富于激情”的艺术个性和他那隽知、深刻的艺术理念,是他将自己的艺术劳动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为当代广大群众写作欣赏”和“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创造中国现代音乐发展的未来”这个轴心上。金湘一生的奋斗不正是过去我们常说的“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或今天大家强调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生动体现吗?

五

人类的艺术劳动都是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又不断发展变化的特殊的创造性劳动。它的特殊性在于它离不开借鉴本地区、本民族为个人所依赖生存的生活环境和审美习惯的历史积淀的影响,它也离不开不同艺术所依赖的特殊工具、特殊表演的习惯和技法的历史积淀,以及人类为了表达现实内心情感变化的个人独创。所以任何艺术品中既包含不同程度的历史传统因素,也必然饱含艺术创造(包括表演)为了表现现时生活感情需要的新的感受和新的探索。在这个意义讲,任何成熟的艺术家,同时也应是一位思想家。他的成熟就表现在他在反复的创作实践中已经能够熟练地掌握为历史所积淀的丰富完备的知识和技能,他的独创就表现在他为了表达现时的感受对已有历史经验的大胆突

破。对历史经验的熟练掌握,要依靠艺术家所必不可少的艰苦学习;对历史经验的大胆突破要依靠艺术创造者在创造过程中不满足于既成经验的敏感和力创新形式和新技术的勇气。前者需要严格刻苦的训练,后者更需要善于边实践、边思索、边总结的毅力。前者取得成功的把握较大、但它终究不是艺术创造的主要目标;后者则往往要经过反复的试探,甚至失败的筛选,才能逐步取得社会的认可和历史的考验。金湘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奋斗,多方面的创作实践中已经在歌剧、合唱及乐队写作等方面取得了令人赞叹的不同成绩,他在长期创作实践中所积累的大量闪光的思想也是值得人们重视的宝贵财富。因此,尽管他现在已步入古稀之年,但长期的生活考验练就他至今还带有一个中年人的壮心和体魄,真诚地期望他在今后还能获得更大更多的成就和收获!另外,我也认为发动后学者以金湘为榜样,总结他的丰硕的创作成就和创作思想理念,必将对创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音乐的发展,带来更丰富的积极影响!这就是我在金湘这本文集付梓前所真诚盼望的!

2011年7月14日

金湘老师是当代中国作曲家、音乐理论家，也是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他创作了大量歌乐作品，如《春晓》、《小河淌水》、《茉莉花》等，广为传唱；著有《金湘音乐文集》、《金湘音乐评论集》等。他的音乐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民族色彩，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序 二

金湘老师的情怀

王次炤

金湘老师早年就学于南京国立音乐院幼年班，后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和作曲系本科，因错划右派于 1959 年下放到新疆，20 年后，于 1979 年平反后调回北京，先后任职于北京歌舞团和中国音乐学院，1990 年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考察，曾任华盛顿歌剧院驻院作曲家，1994 年回国。金湘老师经历了新旧中国两个时代的学业，也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环境；既饱尝了政治运动的苦水，也体验到出国深造的酸甜苦辣……金湘老师的艺术道路可谓饱经风霜、风雨兼程，他在逆境中前进，在挫折中奋起，他用十倍的努力和坚定的意志换来了丰硕的创作成果。正因为如此，金湘老师的音乐充满着戏剧性和深邃的思想，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人生写照。

金湘老师是我最敬重的音乐前辈之一，这不仅是因为金老师在作曲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和他对音乐学术的执着追求；还因为他对音乐艺术的

情怀一直深深感动着我。

我和金湘老师第一次见面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在交谈时,我无意之中提到他当年受政治运动迫害下放到新疆 20 年的事。没想到金老师竟然丝毫没有怨恨之心,他只是淡淡一笑,对我说:“过去的事不必再去提它。我现在没有时间去思考那些事情,我想的只是如何抓紧时间多写几部好作品。再说,那 20 年的生活磨炼正是我的人生财富和创作源泉。”时隔不久从兄弟院校传来关于金湘老师评教授的消息,我听到的都是在为他抱不平的声音,论金老师的学术水平和艺术贡献应该早就被评为教授,但因为种种原因拖延很久。有一天我在学校偶遇金老师,当时另一位在场的老师提起评职称的事,并为他鸣不平。让我意外的是,金湘老师却说:“虽然我没那么清高,还不能把评职称的事淡然处之,但我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作曲家的使命是尽可能多的创作出好的作品来,我在乎的是我的作品是否能得到大家认可。事实上我的作品已得到国内外认可,所以,我现在心里很踏实。”以上两件事,是我对金湘老师的初次认识,它使我看到了一位真正艺术家的内心,他用宽广的心怀把一切悲怨和失落的人生经历都置之度外,留下的只是对音乐艺术执着追求的情怀。金湘老师应该说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在他的近百部作品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歌剧和交响乐。这两种形式是音乐创作中难度最大也最能代表作曲家创作水平的体裁。金湘老师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主要的创作精力集中在歌剧作曲上,尤其是从 1994 年至 2005 年,在这近十年中竟然连续写了 5 部歌剧。金湘老师认为歌剧创作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戏剧结构和音乐结构的关系”,对于作曲家来说,关键在于如何用音乐表现